

河南大学
学术出版基金

魏文帝曹丕传论

宋战利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WEIWENDI CAOPI ZHUANLUN

魏文帝曹丕传论

宋战利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文帝曹丕传论/宋战利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649-0008-3

I. 魏… II. 宋… III. 曹丕(187~226)-评传
IV. K827=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2362 号

责任编辑 杨风华

责任校对 慕 一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272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建安文学”是一个光鲜的起点:五言诗至此成熟,七言诗至此诞生,散文至此呈现出崭新面貌,个性鲜明的文学家开始一批批登上历史舞台。“三曹”名扬天下,“七子”流芳千古,女诗人蔡琰永彪史册。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这是一个令后人无限向往的时代,在这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乱年代里,文学却迸发出后人无法企及的闪光。冷酷的现实与辉煌的文学形成的巨大反差让人瞠目,让人踌躇,让人深思,让人惊讶。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回味、品评、论说、争议的时代。在这个令无数后人无限向往的时代里,曹丕是一个颇受关注的人。

为什么呢?

曹丕在“三曹”之中的评价历来不如曹操与曹植,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创立者,曹植则是建安文学的主将、代表,曹丕的文学成就不及乃父与乃弟,更何况他篡汉自立,政治上饱受争议。

曹丕在文学创作上虽不及乃父乃弟,但是,在文学批评领域中他却颇有建树,他的《典论·论文》历来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

在诗歌体裁上,曹丕的五言诗成就确实不及曹植,但是,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却是七言诗的奠基之作。

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使得曹丕研究变得颇有特点。一方面,曹丕研究远不如曹植研究受人关注;一方面,曹丕的成就又

使人们不能对其完全漠然置之。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现状中，出现了宋战利博士的《魏文帝曹丕传论》。该论文凸现了三大特点。

一是新见迭出。

比如备受人们关注的《典论·论文》，一向只被视为文学批评的专著，宋战利博士则翔实地论证了该书的政治意味，揭开了此书背后的政治背景。

二是角度新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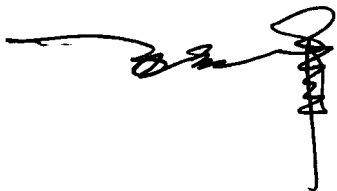
宋战利的《魏文帝曹丕传论》借鉴了当代文学、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全方位地拓展了曹丕研究的角度。由于这些学科的介入，宋战利博士的曹丕研究提出了诸多不为人关注的话题。

三是文献扎实。

曹丕的作品散佚颇多，宋战利博士辑录了曹丕作品的残句断篇二十余则，考辨了相当数量作品的系年，这些文献考辨大大强化了这篇博士论文的学术品位。

在开展曹丕研究过程中，宋战利博士对其全部作品进行校注，并收集众多曹丕研究的资料。这些工作极费精力又必需十分细心。宋战利博士在这些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称道。

宋战利博士是我招收的第一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博士生，在校期间宋战利博士已经表现出他的思考缜密、功力深厚的特点。值此博士论文出版之际，写点个人观感，希望宋战利博士今后在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领域内能够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目 录

序	王立群(1)
引言	(1)
一、曹丕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
二、选题构思和意义	(4)
三、研究方法	(5)
第一章 曹丕的政治人生	(8)
第一节 立嗣之争	(10)
一、曹丕的个人素养	(11)
二、曹操“唯才是举”的选嗣原则	(16)
三、曹丕的政治博弈	(27)
第二节 皇权禅让	(51)
一、承继父命	(52)
二、稳定政局	(57)
三、禅让策划	(61)
第三节 施政措施	(79)
一、乱世赏功,治平尚德	(80)

二、折节下士,礼贤兴国	(93)
三、折冲疆场,企盼一统	(99)
四、威德并施,以惠百姓	(104)
五、苛禁宗室,力推新政	(117)
第二章 曹丕的文学生涯	(150)
第一节 曹丕与文士的交往	(151)
第二节 曹丕的文学创作	(155)
一、曹丕对先代文学的接受	(156)
二、曹丕的文学创新	(158)
三、曹丕文学创作多样性原因解析	(161)
第三节 文气论与文学批评价值的再认识	(171)
一、关于文气论	(172)
二、文学批评价值再认识	(176)
第三章 文学与政治的互动	(183)
第一节 《典论》创作的政治目的	(184)
一、《典论》的创作时间	(185)
二、大胆劝说曹操、卞后“立嫡以长”	(187)
三、说服竞争对手曹植放弃权位之争	(190)
四、告诫大臣要“善处骨肉之间”	(194)
五、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	(198)
第二节 曹丕政治形象与其文学接受史的互动	(200)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200)
二、唐五代时期	(217)
三、宋金元时期	(221)
四、明清时期	(233)
五、《燕歌行》、《杂诗》等名篇的个案分析	(244)

第四章 曹丕文学史料考论	(253)
一、曹丕诗文本事系年综考	(253)
二、南皮之游在何年	(286)
三、《七步诗》托名考	(290)
四、建安文学分期略说	(308)
五、建安文学领袖考	(312)
结论	(321)
附录：曹丕作品辑佚	(324)
参考书目	(327)
后记	(339)

引言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从献帝手中接管下满目疮痍的汉室江山。禅让仪式结束后,他意味深长地叹道:“尧舜之事,我知之矣。”^①曹丕从曾是陈留王的献帝手中攫取皇权,司马家族又积三代之功从曹氏手中同样以禅让形式帝有天下,封魏少帝曹芳为陈留王。曹家天下又用陈留王画了个句号,历史就是如此循环。

曹丕践祚,虽有少许反对之声,但大多是赞同和颂扬。就此来看,一些历史人物对社会和事态的洞察,对重大事件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对民众心理的把握总是超乎常人之上。然千百年来,正统论者一直痛骂曹操父子为“汉之鬼蜮”。这个恶名挥之不去,犹如曹丕在《鸛赋》中所述:“痛密网而在身。”^②郭沫若先生一反常论,发出振聋发聩之声:“就是曹丕吧,在政治见解上也比乃弟高明得多,而在政治家的风度上有时还可以说是胜过他的父亲。如令宦人为官不得过诸署……诏营寿陵力求俭朴等等,

①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② 曹丕:《鸛赋》,见夏传才等《曹丕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处处都表示着他是一位旧式的明君典型。”^①曹丕的文学在后世的影响和接受也走过一条坎坷之路。

一、曹丕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曹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大量作品的皇帝文学家,在文学和文化史上创造多项第一:(1)七言体《燕歌行》被喻为“七言之祖”。陈祚明说:“后人作七古,句句用韵,须效此法。”^②(2)杂言体《大墙上蒿行》,句法参差,对后来的歌行体有首创意义。王夫之评道:“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③(3)《典论·论文》首次提出文气论、文体辨析问题,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重大影响。(4)首创“建安七子”说。“七子”成为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热点。(5)编定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后世帝王竞相效仿,《广记》、《御览》等类此。《玉海·艺文》曰:“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在中国文化史上,曹丕所开创的诸多第一,若据其一就应青史垂名,然而“乱臣贼子”的政治形象犹如阴云遮掩了他的文学光辉。

自古众多评论家认为曹丕的文学才华与成就不高。对这种论调,从刘勰开始都在试图纠偏,后又有王世贞、王夫之等的极力回旋,但儒家正统观念或者说政治哲学依然主导着文艺的方向,故贬抑始终多于褒扬。在政治形象未定型前,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后世论者多专注于此而忽略其文学价值。

西学东渐之后,人们渐渐脱离儒家的正统思维模式,开始用新的哲学和文艺理论观照中国古代文学。上世纪50年代以前,

① 郭沫若:《论曹植》,见《历史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7页。

②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③ 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研究曹丕的专著和论文较少,有黄节的《魏文帝魏武帝诗注》^①、陆侃如的《建安曹丕诗谱初稿》、傅庚生的《文论主气说发凡》、范宁的《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解》和《文笔与文气》等。同时出版的文学史中也有对曹丕的评论,如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等。在诸文学史中评论的重点一是乐府诗,二是《典论·论文》。肯定曹丕的声音在逐渐增强,贬抑之声也时有回响。鲁迅先生称:“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②此说多为后人采纳。然赵景深先生的《中国文学小史》评道:“曹丕的诗好的很少。”^③

50年代以后,余冠英、徐公持、罗宗强、逯钦立、曹道衡、张可礼等前辈在曹丕研究方面用功甚深。此期,曹丕研究的论文渐多,更多的学者则不拘泥于旧论,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价曹丕文学创作的特色、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章新建《曹丕诗歌的写实精神》和《曹丕诗歌与乐府》、徐定祥《论曹丕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程天祐《试论曹丕对文学革新的贡献》、夏传才《〈曹丕集校注〉序》、周家驹《曹丕放议》、丁复《论曹丕诗:兼论对“建安风骨”的再认识》、许善述《“子桓以下,纯乎魏响”:也谈曹丕诗风之变》等。在研究著作方面,章新建的《曹丕》对其生平与创作做了较全面的研究;徐公持的《曹丕评传》对曹丕生平、创作及有关引起争论的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同期出版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中,都对曹丕的文学成就作了公允、肯定的评价。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章培

① 1958年重版时改为《魏武帝魏文帝诗注》。

② 鲁迅:《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7页。

③ 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

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罗宗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王钟陵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胡国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王巍的《建安文学概论》等。在文集校注方面，则有余冠英的《三曹诗选》、夏传才和唐绍忠的《曹丕集校注》以及傅亚庶的《三曹诗文全集译注》等。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对曹丕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与“文气说”的分析最为透辟。

尽管如此，曹丕研究与其父曹操和其弟曹植相比，无论是在论文数量，还是在研究深度上皆嫌不足，主要缺憾是：对曹丕的政治和文学贡献认识不足；对他的文学在后世的接受和影响研究不够深入；对有关曹丕的文学史料缺少系统的收集与整理，等等。如此，正是本书所要努力探究的主旨。

二、选题构思和意义

本书分四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全面描摹曹丕的政治人生。通过史料的钩沉与分析，依循曹丕政治成长、成熟的轨迹，逐步展现其少年时的勤学博问，立嗣斗争时的政治谋略，皇权禅让时的政治勇气，执掌国政时的革除旧弊，以及实现华夏统一的雄心壮志。

第二章，主要论述曹丕的文学贡献。曹丕从习诗作赋开始涉足文坛，在与“建安七子”的交往中文学创作逐步成熟。他的文学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贵公子时期；二是太子时期（含立为太子前四年）；三是皇王时期。本章论述了曹丕在文学创作上的创新成就，分析了其文学创作多样性的原因。

第三章，曹丕的文学道路和政治人生呈现互动。生前，政治地位的变化影响着曹丕的文学风格；死后，他的文学和接受又与他的政治形象密不可分，为君者倡之，论者多颂；为君者恶之，论

者多贬。本章以接受美学为视角尽力勾勒曹丕文学与政治的交互作用。接受美学常常从历时性角度对先代作家的文学开展研究,有利于全面系统地了解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史和效果史。

第四章,考证曹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曹丕研究中,他与曹植的关系是个传诵已久的话题。通过对史料的梳理,结合版本学、创作论等文献和理论,本书认为:曹植《七步诗》乃南北朝时期托名而作。同时,本章对建安文学分期、建安文学领袖、曹丕诗文本事系年等进行了认真考证。

本书试图通过对曹丕政治和文学人生的全面梳理,廓清长期以来对曹丕的错误认识,对他的政治和文学贡献有一个清晰而公正的评价,还原一个真实的曹丕形象。

三、研究方法

普通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微不足道,而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作用却显得十分耀眼。世事迁换,物是人非,在对前人的认识中,人总是难以跳到历史的界外,往往受到成见和历史时态的限制。当时是对的东西,在后人看来也许是错误的,反之亦然。

第一,以文献为基础。历史与现实是依靠文献连接起来的。刘勰曰:“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①任何研究都要立足文献和事实,尤其是对历史人物和作品的研究。文献是客体,而阅读者是有思想的人。阅读文献要善于思考,善于与古人交流,“尚友古人”。在广泛阅读有关曹丕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占有第一手信息,烂熟于心,然后进行比对校勘,多思存疑,发现问题,论证时做到考证详实,言之有据。不疑

^①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处有疑新意乃出,新意的产生需要知识的累积。

第二,以科技为手段。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仅对现代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古代文学和文献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方便快捷的文献检索系统能让我们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

第三,全面梳理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全面梳理有利于把握整体,个案分析又能深入细微。在整体把握中,发现问题,进行典型分析和专题研究,运用逻辑分析、归纳推理等方法对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如在对曹丕的政治人生进行全面研究时,又专题探讨了其宗室政策和《七步诗》的真伪;在叙述其文学的接受和影响史时,对《燕歌行》等名篇做了典型分析。

历史具有诱人的魅力。雅斯贝尔斯说:“对于我们的自我意识来说,没有哪一种实在比历史更为重要。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最广阔的视野,给我们带来了传统的种种内容——我们的生活正是建立在这些内容之上的;它也为我们指示那些衡量‘现在’的尺度,它还使我们摆脱无意识的束缚而趋向我们自己的时代,并教诲我们从人的最高潜能与不朽的创造中去认识人。”^①我们从历史出发去观照文学时会展开一个新的视界,文学的“内在呼唤性”引领我们,让我们感受不同作家、不同作品带来的审美愉悦。生活于一定时代的人,其个人的价值取向总受到时代精神的左右,曹丕思想的成熟和发展也与他生活的时代紧密相连。

本书力争用客观的态度,不饰美,不隐恶,还原曹丕的真实人生。今人重阅历史,仅能利用史料钩沉和推理,而本真却是鲜活的,稍纵即逝。记载的历史与本真总是有所差异,我们只能通过文献的描述去接近它,从中寻找历史的启示和借鉴。

^① 转引自王顺达:《神圣政治——中国传统政治的形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

历史人物在其所处的时代,无论多么强悍、强势或桀骜不驯,对后人来讲总是那么平静和富有美感,我们终究只能感知那个遥远的时代。无论我们从内心良知还是从学术的准则出发,试图客观地表述那个时代、那些人物,但我们毕竟是一个主观的研究者,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总有自我的影子。范宁先生说:“历史事实的有无,我们是无法覆验的。我们只能根据现在的史料,推测这些记载符合不符合当时的情境,是一种可能性的假定,不是现实必然的发生。所以,多多少少总带有一点空想的意味,想象的成分,普通所说的艺术性。”^①

^① 范宁:《历史与文学》,见《范宁古典文学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第一章 曹丕的政治人生

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中,总有一个中心在发挥作用。不管是制度的设计,还是普遍的民众心理,皆推崇守中抱一。反映在现世生活中,就是民众渴望明君贤相,让人民能够集中在其周围。传统政治一再对明君德政进行美化和渲染,鲜有民主的思想作为支撑。

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思想之精神和方式,常常是儒道互补。儒家为政,“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道家则本于自然,信奉无为而治。

尧舜时代渐去渐远之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家天下的政治理念,又通过一次次的改朝换代得到固化,一次次的“天命难违”得到神化。君权成为老百姓顶礼膜拜的神物,于是皇帝高居人世之巅。普通民众长期处于权力的心理高压之下,渐渐变得顺从起来,他们甚至能够容忍君王的恶行,“在世界史上,中国式的尊君,其制度之完备,其理论之发达,其文化之强韧,可谓登峰造极矣!”^①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革易微乎其微。

拥有最高权力,不仅能够不劳而获,还能作福作威。臣民在

^① 刘泽华:《中国帝王观念·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皇帝面前必须恭谨以示尊敬。孔子曰：“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①天子御用之物，贵为诸侯也不得僭越，普通民众更不敢越雷池半步。董仲舒曰：“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②“夫帝王之居，外则饰周卫，内则重禁门，将行则设兵而后出幄，称警而后践墀，张弧而后登舆，清道而后奉引，遮列而后转毂，静室而后息驾，皆所以显至尊，务戒慎，垂法教也。”^③帝王与民众处于阶级的两极。贾谊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④韩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⑤君主更拥有作威作福之权。卫觐曰：“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所恶者贫贱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爱之则富贵显荣，君恶之则贫贱死亡；顺指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从至也。”^⑥论及君主职责，管子曰：“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⑦从历史的经验看，明君有时对六柄的运用不一定纯熟，而一些暗主却能够得心应手。正因为最高权力的巨大荣宠，才使权力斗争失去人性，呈现出许多血腥的场面，“觊觎君位的人，不惜使双手溅满鲜血，哪怕是同胞手足的

① 《论语·乡党》。

② 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

③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

④ 《贾谊集·治安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96页。

⑤ 韩愈：《韩昌黎全集·原道》卷十一，中国书店，1991年，第173页。

⑥ 《三国志·魏书·卫觐传》。

⑦ 管仲著，姜涛注：《管子新注·任法》，齐鲁书社，2006年，第339